

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方向, 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牛 太 臣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学术性的事业单位。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促进高等学校教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与其他出版社相比,大学出版社更具有学术性、专业性、层次性和服务性。学术性比较强,专业面比较窄,出书层次比较高,直接为教学服务。要发挥高等学校的优势,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需要经过艰苦的、长期的努力。

武汉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981年12月。建社9年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方向,共出书700余种,其中教材和专著占78.5%,先后有61种书获得国家、部委和省级以上优秀图书奖。在近两年出版业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断调整结构,优化选题,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整顿出版社,坚持正确方向,遵守出版纪律,实行经营责任制,扭转了被动局面,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好势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的主要体会是:要办好大学出版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教材专著与其它图书、校内与校外、重点与一般、依靠学校支持与发挥本身的积极性等诸方面的关系,发挥学校优势,群策群力,解决知识分子出书难,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一)、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出版工作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不少出版社见利忘义,不惜出坏书赚大钱。我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先后抵制了30余种内容淫秽、格调低下或政治倾向不好的书稿的出版,如《为匈牙利哭泣》、《蒋介石研究》、《中国权力之路》等。与此同时,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出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和优秀教材。1988年出版学术专著40余种,亏损20余万元。1989年出版学术专著90余种,亏损40余万元。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中国民主党派史》、《训诂学初稿》等优秀著作,每种亏损都在万元以上。1988年秋,我社资金短缺,正常生产发生困难,曾有人建议出几本“擦边球”式的书,以解决燃眉之急,但为我社绝大多数同志所拒绝。相反,社领导组织编辑反复讨论,确定双效益的重点选题和书稿,安排力量,认真落实方面,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二)、正确处理教材、专著与其它图书的关系,坚持大学出版社以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作为主体出版物,适当安排其它层次的效益较好的图书的出版。在制定年度选题计划时,坚持教材、专著占70%以上,其它图书不超过30%。1989年选题计划中,教材专著占75%,1990年占77%。我社立足校内,面向全国,接受260余种教材出版任务,其中国家教委选编教

材60余种,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及大纲144种,国家教委图工委教材12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12种,其他部委教材12种。每年还安排40余种校内自编教材和兄弟院校的教材。除根据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推荐出版本科生教材外,还将根据研究生院的安排,出版研究生系列的教材。

(三)、正确处理校内与校外的关系,坚持以校内教师著作为主,发挥本校多学科的优势,努力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我校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不少学科具有自己的特色或居国内先进水平。只有依托学校,发挥优势,才能反映出学校特色,办出出版社特色。为此,在制订选题规划和年度选题计划时,我们坚持做到以下几方面的结合:(1)选题计划与教材建设计划相结合,促进教材建设,提高教学质量;(2)选题计划与科研规划相结合,为重点科研项目服务,出成果,出人才;(3)选题计划与重点学科建设规划相结合,发展学科优势和特色,提高学术地位;(4)选题计划与师资队伍规划建设规划相结合,促进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确定选题时广泛听取各院、系和学校主管业务部门的意见。1988年12月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组织出版《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成立了以齐民友校长为主任委员、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丛书编审委员会,每年出版国内或校内第一流水平的专著15种,三年50种左右,目前已确定选题21种,出书6种。为促进中青年教师成长,反映中青年教师科研成果,组织出版《珞珈青年丛书》,已出书2种。为扶植重点学科、骨干教师成长,协助研究生院出版博士点教师专著,已出书10种。与教务处配合,出版主干课程教材,每年40余种,这些教材和专著,有的已形成我校特色,如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系列书、图书情报系列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书,在去年第二届全国书展中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又如韩德培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梁西教授主编的《现代国际组织》、法学教材编辑部编的《国际关系史》被评为国家教委、司法部的优秀教材,加上已经出版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私法(冲突法篇)》以及与此配套的《国际投资法教学资料选编》、《国际投资法成案选》、《国际经济法教学资料选编》、《国际经济法成案选》、《国际私法教学资料选编》等,已成为我国第一套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系列教材,被许多高等学校广泛采用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再如陈光祚教授主编的《科技文献检索》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与之配套的《情报语言学基础》、《情报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目录学》、《分类学》、《图书馆学导论》、《图书营销学》、《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馆文献编目》、《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等,也成为我国第一套图书、情报学的系列教材,为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专业、科技情报专业和电大、自学考试的学生采用。

有不少学术专著是国内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如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蕃文书初探》,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强烈反映,使一些持有“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的外国学者改变了观点,承认敦煌研究中心也在中国。目前,《敦煌吐鲁蕃文书再探》即将出版。吴于廑教授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书,用整体的眼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世界历史,为编写出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历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注目。另外,刘涤源、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教授的专著《经济学大纲》,已故著名学者黄侃教授的《字正初编》、陶德麟教授著《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肖萓父教授著《中国辩证法史》、胡迪鹤教授著《随机过程概论》等,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法学概论》去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

(四)、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不断优化选题,调整结构,突出重点。出版社的选题

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根据系统性、科学性、整体性、可行性的原则,正确处理长远与近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需要与可能等方面的关系,加强宏观控制,确定“重点工程”、重点选题,克服杂乱无章、内容平庸、重点不突出等弊端。这是办出出版社特色的关键。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扩大出书规模,而是抓紧“重点工程”的建设。除了《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外,从今年起,还将组织校内专家编写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为配合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即将出版《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丛书》;为促进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拟出版《今日湖北》系列书。目前,已组成专门班子,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进一步确定“重点工程”选题和年度重点书,为制定我社“八五”出版规划作准备。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此十分关心,非常支持。

(五)、学校领导重视,各部门支持,群策群力,解决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学校党委和校长非常重视出版社的工作,经常听取出版社工作汇报,及时帮助出版社解决困难。1989年下半年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组建了出版社党委,理顺了出版社与下属两个印刷厂的领导关系,建立了编、印、发相互配套的管理运行机制。学校党委把出版社的出书质量和水平作为反映学校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而不把出版社当作创收单位。1988年12月建立武汉大学出版基金,组成以陶德麟副校长为主任委员,教务长、总会计师和出版社社长为副主任委员的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筹集和审批事宜。研究生院、教务处、自然科学研究处、社会科学处都拨出一定经费来资助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出版。各院系用自管经费资助教师出书的学校财务部门都予以支持。1989年学校用于资助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的经费近30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如石泉教授专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部高水平的、具有明显特色的学术专著,学校拨款3万元资助出版。

目前,全社职工认真贯彻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进行形势教育,深化改革,修改完善经营责任制,进一步调整结构,突出重点选题,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努力把我社办成有特色、有影响的大学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 江平 杨小岩)